

同济亚太研究论丛

3

蔡建国◇主编

21世纪的东亚： 机遇、挑战与创新



*21shij de dongya: Jiyu
Tiaozhan yu Chuangxi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同 济 亚 太 研 究 论 丛

蔡建国◇主编

3

21世纪的东亚： 机遇、挑战与创新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的东亚:机遇、挑战与创新 / 蔡建国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ISBN 7 - 80681 - 544 - 9

I. 2... II. 蔡... III. 国际问题 - 东亚 - 文集
IV. D81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170 号

书 名: 21 世纪的东亚:机遇、挑战与创新

主 编: 蔡建国

特约编辑: 崔志鹰

责任编辑: 常 工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 @ online. sh.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81 - 544 - 9/D · 051

定价: 23.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吴启迪

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建立已届周岁。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研究中心的主持者蔡建国教授全心投入,身体力行,联络和团结了一批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并积极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亚太研究论丛》形式,陆续出版。对此,我十分赞赏和支持。

同济大学建立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背景:第一,是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济大学在新世纪里正向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现代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努力。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求学校的学科门类和专业设置必须更为齐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必须同时增强。第二,是学校加强对大学生素质教育需要。而学生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知识素质、技能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的提高,人文科学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科学的人文知识,对学生的思想影响和世界观的正确形成,更为直接和重要。所以,学校在保持理工优势学科之外,加强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建立就是其中之一项。

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也是一个世界大国。随着国家的对外

* 本文是同济大学原校长吴启迪 2002 年 4 月 22 日为《亚太研究论丛》第 1 辑所作的序;从第 2 辑起,本文为《亚太研究论丛》的“总序”。

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正在亚洲和世界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快。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意识,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具有世界优秀文化的鉴别能力和世界优秀文化的吸收能力。这些要求正是促使我校设置国际政治专业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亚太研究中心建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我深信,《亚太研究论丛》的出版,不仅对同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教育是一种支持,也是对其他专业的学生扩大国际视野和增加国际知识的一种支持行动。因此,我要向所有《亚太研究论丛》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祝愿《亚太研究论丛》受到读者欢迎。

2002 年 4 月 25 日于同济园

前 言

《同济亚太研究论丛》是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性论著。它作为同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出版物之一,提倡以科学的立场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理性地观察世界,客观地分析国际和地区间的敏感问题,在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国际关系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研究的基础上,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本论丛自创办以来,得到同行们的关心和支持,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三辑。

本辑论丛收入 24 篇论文。这是今年 7 月初,在由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召开的“21 世纪的东亚——机遇、挑战和创新”学术讨论会的基础上,学者们从多元的角度,分析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态势下,东亚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就如何以创新的精神构筑新世纪东亚多边合作机制关系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东亚区域合作发表高见。

曾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东亚地区,随西欧工业革命的兴起而逐渐落后,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及东盟在内的东亚国家经济以惊人速度崛起,使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融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

发展中的东亚前景更为灿烂,“东盟+1”、“东盟+3”机制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进入酝酿阶段,区域一体化的趋势

正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对话、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给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所产生的矛盾、摩擦以及各种误解也给东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中日关系、韩日关系、朝鲜半岛局势等,给东亚在未来发展中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面对机遇和挑战,东亚国家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这就需要在文化观念、价值标准、政治对话、安全战略、经济机制等多方面以务实和创新的精神审视问题,巩固区域合作的成果,扩大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和不利因素,开创多边合作的新格局,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目前,东亚区域合作的特点是经济合作发展较快,安全合作相对滞后,双边合作强于多边合作,这是因为:东亚各国间的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均;缺乏引领的主导力量以及受到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等因素,因此,在构筑未来东亚国际关系、发展区域合作时,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思考:第一,从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一大局着眼,冷静、理性地处理国与国关系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均衡发展东亚诸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扩大合作空间,如在反恐、区域合作、环境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扩大相互依存度,减少相互对立因素;第二,要加强研究和深入了解对方,加大研究对方的力度,重视人与文化在多边关系中的作用,将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赖关系落到实处,以经济促政治,以文化增理解,进一步发展相互合作关系;第三,政治家要有全面驾驭和推进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的胆略和处理问题的高超手法,大力培养具有未来思考型人才,这种人才不仅需要具有应对双边、多边关系的能力,而且要具有将它放到世界格局中予以思考的能力。

中国在中共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正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与东亚多

国保持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要站在战略高度,发展与多国的关系,加强合作,重视民间外交的作用,为繁荣东亚,繁荣亚洲,繁荣世界,发挥一个大国应尽的作用。

蔡建国

2004年9月于同济园

目 录

吴启迪 总序/(1)

蔡建国 前言/(1)

第一编 东亚地区政治、安全形势

俞新天 认识和避免当今的冲突和战争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3)

庄建中 东亚安全合作与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刍议/(18)

薛 晨 “9.11”之后亚太安全理念的变化/(28)

夏立平 论中国和平崛起与东亚安全/(38)

张 沛 中国和平崛起与东亚安全机制/(53)

吴寄南 中日关系: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66)

徐慧娟 武心波 中国的崛起与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种新地缘政治学的解读/(87)

胡令远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日关系/(111)

王少普 战后日本区域主义方针的形成与发展/(121)

崔志鹰 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变化与韩美同盟的未来/(140)

方秀玉 朝鲜核问题与东北亚地区安全/(150)

邱美荣 危机博弈与美朝核危机的可能走向/(172)

何英莺 2004 年日朝关系的新动向及其意义/(186)

余建华 东南亚反恐问题:未可乐观的安全挑战/(203)

第二编 东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 王国兴 21 世纪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趋势、挑战与创新/
(223)
- 田中青 论“东亚共同体”/(239)
- 龚克瑜 区域一体化中的东北亚经济合作/(253)
- 王伟军 对进一步加强中日经济合作的思考/(268)
- 戴晓芙 日本的对外经济与东亚/(278)
- 孙立坚 朱薇娜 再论日本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89)
- 丁剑平 日美联合干预汇市与中国的汇市开放/(308)
- 蔡建国 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323)
- 郭洁敏 论东亚认同感形成的条件与基础/(333)
- 徐静波 从汉字文化圈的基盘看东亚一体化的可能性
——以中国汉字文化在日本的影响为中心/(345)

第一编

东亚地区政治、 安全形势

认识和避免当今的冲突和战争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

俞新天 *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剧变,对于战争与和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冲突与战争的类型和动因都发生了变化,人类面临着新的安全威胁。这一重大的变化使得中国必须重新认识安全威胁的来源和特点,确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以新思想来避免和应对威胁、冲突和战争。针对中国面临的独特安全威胁,中国必须进行独特的选择,探索和平崛起的道路,预防、化解或缩小冲突和战争,保证战略机遇期的实现。

冲突与战争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冷战时与冷战后不同。冷战时期的战争主要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利益的战争;第二类是前苏联和美国两个阵营的争夺战;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四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由于反殖民主义的胜利,第一类战争已基本结束。随着苏联的解体

* 俞新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和东欧国家的转向,第二类战争也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两类战争便非常突出,再加上新出现的因素,因此,冷战后的冲突和战争大约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类是干预战争,往往是大国或国家集团对另一国的武力干预;第四类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目前主要指大规模危害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对于第四类的争议很大,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将恐怖主义归入犯罪,另一种则认为应归入冲突和战争。笔者持较为折衷的观点,只把大规模的危害严重的恐怖主义列入战争。其实在传统冲突与战争中,规模太小的也往往不进入统计。我将恐怖主义归入战争,还出于更前瞻的观点,即将来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非传统冲突和战争,也不应忽视。

不仅战争类型发生了变化,而且战争的动因也大为不同。在冷战结束后的头 10 年,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占据了所有冲突和战争的 90% 以上。从数量上看,这并非新现象,因为在冷战时期,绝大部分的战争就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引起战争的动因不同。在冷战时期,新兴国家之间兵戎相见主要为了争夺资源要地和战略重镇^①。而冷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原因却与民族、宗教和文化相关,当然也仍有经济和战略的争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为民族平等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为民族主义的高涨铺平了道路。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异,在封闭的小型社会中,往往不被察觉,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却突出为人们安全的保障,认同的核心。今天的民族主义一般表现为特殊形式的爱国主义^②。民族主义在更深刻、更基本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完全胜过任何意识形态的作用^③。同时,世界上又极少有单一民族国家,一国之内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十分普遍,跨界民族和跨界宗教的情况

也十分常见,复杂的交织使得国内纷争容易溢出为国际冲突。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容易酿成冲突和战争,因为它们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较低。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各国经济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富国之内、富国与穷国之间和穷国之内的贫富悬殊,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加上现在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弱势群体具有无助、绝望甚至逆反的情绪。这就成为各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温床。一些群体和组织可能采取暴力行动,造成如正规战争那样巨大的破坏和伤亡,甚至更严重。全球化也使得恐怖组织、海盗组织和贩毒组织更容易获得武器包括核武和化武,更容易建立国际网络。它们不受任何国际法的约束,毫无顾忌地针对平民,以便获得最大的震慑作用。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全球变暖,将使许多国家失去领土,环境破坏导致争夺水资源和其他重要资源,某些致命疾病的流行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亦潜伏着冲突的可能性^④。

另一个新的动因是外来的干预增强。外来干预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地区组织内达成共识的干预,包括以武力解决足以影响地区稳定的争端、动荡和冲突,例如非洲联盟对大湖区的干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似乎仍有争议,欧洲国家也在反思。二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强化,倾向动武解决问题,实行先发制人战略,而其他各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其行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便是明证。时至今日美国仍未发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证据,其开战的合法性更令人怀疑。美国干预他国的战争一贯存在,但这次却具备了新的特点。它以反恐、反扩散为理由,绕过联合国决议,不顾欧洲盟友的反对,抛弃北约,建立“志愿者联盟”,反映了“9.11”事件后的新战略。由于美国的

经济、军事和软力量都处于巅峰状态,外出干预的动机仍然是存在的。

对于未来战争和平趋势的把握,可以做出以下判断:

——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不会爆发。因为大国之间既无对抗能力也无对抗意愿,真正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仍然是大国。虽然现在也有人认为,反恐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但似乎并未达成共识。目前存在的冲突,基本上在地区或次地区层次上,绝大多数国家总体仍处于和平状态。但人们仍普遍地感到不安全,或者说对于安全的要求已经提高了。其原因是全球化使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今天的威胁也确实分散化了。

——冲突与战争的高发区域在欧亚大陆的“柔软下腹部”,即从巴尔干、中东、高加索、中亚、南亚直至东亚的弧形带,非洲和某些拉美国家。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困难,转型的阵痛,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交错等复杂因素,成为最不稳定的地区。

——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如金融危机、“9.11”事件、“非典”、禽流感等等,其中有些与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如“9.11”事件所引起的战争,有些则不然。

——面对新的挑战,各国具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同时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两大问题最值得关注。

第一个问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应当如何判定性质,如何应对。围绕着反恐、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产生了巨大的认识分歧,在欧美之间、“老欧洲”与“新欧洲”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甚至在一国之内的政府与民众之间、民众中的不同派别之间,观点之大相径庭,前所未有。对此的分析和评论,已经汗牛充栋,不必赘言。我要强调的是,这反映了人类处于剧变世界中的迷惘和探索。传

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只关注国家之间的行为和互动,对其他行为主体相当忽视;基本上侧重于政治的领域,而将其他领域视为低级,由此产生了“高政治”和“低政治”之区别。它很难解释今天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提出了“国际政治”和“全球化”两条主线并存的想法,有的人区分了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等概念的内涵,确实有启发作用^⑤。事实上,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全球关系的综合理论,来解释人类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国际关系即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其他主体,既关注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也包括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应对的全球治理。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等对世界的影响相对上升,“低政治”正在升高,甚至侵入到战争与和平的“高政治”之中。与此相应的是,非国家政府主体的作用在增强,迫使国家政府这一最有力的主体重视它们的存在和力量。当然,这完全不是贬低国家的作用。因为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人类一定会运用各种组织方式来应对,而目前最强大的组织仍然是国家及国家组织。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新的威胁与挑战。显然,我们原有的思想、原则和规范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新的思想、原则和规范。而且,必须传承更新,最终除旧布新,不至于在转变过程中弄得无效失范,天下大乱。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基本思想,也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基础,目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国家主权在解决国内、国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的冲击时,暴露出缺陷、软弱和无奈,连惟一的超级大国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关键时刻,选择去干预或被干预,与传统的 sovereignty 原则是抵触的。一旦国家主权的概念和原则进行调整,就会使整个国际组织和机制的根基动摇,必然随之进行重大变更,所有的主体尤其是国家还